

最低工资会抑制创业吗?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吴群锋¹ 蒋为²

(1.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2.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的创业选择模型, 并提出理论假设, 从理论上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对创业的影响。进一步, 采用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与检验。研究表明: 最低工资标准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效应显著抑制了各地区的创业活力, 这一创业抑制效应不仅表现在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上, 而且体现在对创业规模的抑制效应上。研究结果同样表明: 最低工资对创业的抑制效应对于不同的创业行业与创业类型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对于服务业项目的创业与创立企业、合伙企业的创业类型的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 创业活动; 企业家能力; 差异性; 成本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6)06-0001-10

DOI:10.13269/j.cnki.ier.2016.06.001

一、引言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逐步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速逐步从高速增长轨道向中高速增长轨道转变, 创新创业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创业, 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1], 而且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在此背景下, 党中央与国务院大力推动“大众创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创造力, 通过提升中国经济的创业活力促使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然而, 现实中制约中国创新创业活动的制度因素仍然有待消除, 尤其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对经济活动造成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由于政府面临目标的多重性以及官员晋升考核, 政府众多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也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 而最低工资的确定与增长目标便是其中的典型。

自 1994 年中国正式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 最低工资制度越来越成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 尤其在 2008 年中国颁布实施了新《劳动法》, 明确规定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最低工资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从一个软性工具逐渐向硬性工具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 各个地区也越来越重视对最低工资政策工具的运用, 以越来越高的频率调整最低工资水平, 调整过程中甚至表现出显著的“攀比行为”^[2-4]。各地政府这种“攀比行为”会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高, 而过高的最低工资却会使经济行为产生扭曲并损害经济绩效。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 并采用微观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进行检验与分

收稿日期: 2016-09-06; 修回日期: 2016-10-26

作者简介: 吴群锋(1991—), 男, 福建泉州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国际贸易; 蒋为(1988—), 男, 新疆喀什人,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组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133)

析。本文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激发居民的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是近年来众多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方面,许多研究关注于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因素。例如,叶静怡等^[5]以工人可能采取集体行动破坏市场关系为逻辑起点,证明了政府实行最低工资政策是实现社会帕累托改进的有效政策手段。宁光杰^[6]认为最低工资是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博弈的结果,失业率水平的下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都能够提高政府所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则关注于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例如,马双等^[7]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的提升会提高企业的平均工资,并显著减少制造业企业的雇佣人数。胡涛和杜丽群^[8]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发现了最低工资可能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社会个体福利的下降。赵秋运和张建武^[9]则发现,在国际贸易背景下,最低工资的扭曲引起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再分配,从而导致了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

此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微观主体的创业活动,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于传统的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同时针对政府行为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一方面,个体的风险偏好等心理特征、所掌握的知识信息,以及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都是个体进行创业决策的决定性因素^[10-12],而个体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等对创业活动也有重要影响^[13-14]。另一方面,国家产业政策、制度环境水平也显著地左右着社会的创业活动^[15-16]。周京奎和黄征学^[16]发现,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下降提高了国有单位员工下海创业的倾向,且这一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同时存在。吴晓瑜等^[17]进一步发现,较高的房价通过负的“替代效应”阻碍了无房人员的创业行为,而对有房人员的创业行为则产生了不确定的影响。吴一平和王健^[15]则指出了制度环境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当一国制度环境较差时,拥有政治关系网络的个体倾向于通过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资源,从而导致创业市场产生扭曲。

现有研究不管从最低工资着手,还是对创业行为的研究,均没有探讨最低工资究竟是否影响到中国居民的创业行为,对于其微观机制更是知之甚少。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的创业选择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不仅从理论上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对创业的影响,而且进一步采用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与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与贡献:一方面,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了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中国居民创业活力的微观机制。创业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企业家才能,而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活动带来了更高的机会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产生了无谓的企业家才能门槛,阻碍了一部分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个体从事创业活动。另一方面,本文采用微观层面的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的方法,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本文的研究不仅集中于对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的检验,而且对不同行业与创业类型在最低工资影响上的差异性做了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二、理论模型

在 Guiso and Schivardi^[18]的基础上,本文将最低工资纳入创业选择模型中,分析最低工资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假设居民自由选择职业,居民要么选择成为工人获得工资 w ,要么选择成为企业家将劳动力与资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当且仅当企业家的利润大于零的情况下居民将选择成为企业家。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bar{w}),该标准高于该国的市场均衡工资,且最低工资设定在能保证该国所有劳动力都获得最低工资收入的水平上。在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者劳动力市场粘性等条件的情况下,厂商所支付的报酬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提高将增加居民创业时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居民的创业意愿。

本文假设企业家从事生产需要投入资本(K)与劳动(L)两种要素,且每位企业家具有异质性的企业家才能 x_i ,越具企业家才能的厂商生产效率越高。假设企业家按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组织

生产,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_i = x_i K_i^{\alpha_K} L_i^{\alpha_L} \quad (1)$$

其中, Y_i 为产出; α_K 、 α_L 分别为资本、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x_i 为创业者的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越高,则在投入要素一定的情况下产出也越高。为便于分析,假设厂商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均是完全竞争的,则所有厂商面临相同的产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产品价格(P)、工资(w)和利息(r)。居民选择创业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为 c 。因此,创业者的经济利润如下:

$$\pi_i = x_i P K_i^{\alpha_K} L_i^{\alpha_L} - w(\bar{w}) L_i - r K_i - c \quad (2)$$

其中,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取决于最低工资的高低,即 $w(\bar{w})$ 与 \bar{w} 呈正相关。当且仅当创业者的利润大于0的情况下,居民会选择创业。因此,居民选择创业将存在一个企业家才能的门槛值 \bar{x} ,当居民的企业家才能高于门槛值,则选择创业;若低于门槛值则选择成为工人。由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创业者的利润函数 $\pi_i(x_i, w(\bar{w}))$ 。由利润函数的性质可知,利润函数 $\pi_i(x_i, w(\bar{w}))$ 与企业家才能 x_i 呈正相关,与最低工资标准 \bar{w} 负相关。根据利润函数的特征,可以得到居民的收益与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关系图(见图1)。

当企业家才能高于门槛水平时,居民能够从创业中获取更高的收益,居民将选择创业,而此时的居民收益为创业利润与劳动工资之和。随着企业家才能的提高,居民的收益也随之提高;若居民的企业家才能低于门槛水平,居民则放弃创业而选择成为工人,此时居民收入为劳动工资。图1中分别绘制了最低工资标准更低情形下的居民收益曲线 $R_i(x_i, w(w^-))$ 与最低工资标准更高情形下的居民收益曲线 $R_i(x_i, w(w^+))$ 。由图1可以观察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居民创业时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值也不断提高,企业家才能的门槛值由 x_1 提高到 x_2 。企业创业门槛的提高可以理解为两条渠道:一方面,最低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居民创业的机会成本,这表现为 $R_i(x_i, w(w^-))$ 向上移动的垂直效应;另一方面,最低工资的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表现为 $R_i(x_i, w(w^-))$ 向右平移的水平效应。最低工资对于创业的抑制效应正是从水平效应与垂直效应两个方面发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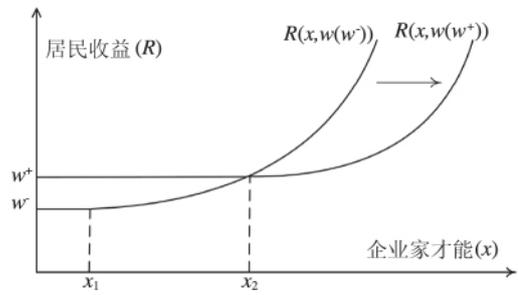


图1 企业家才能与居民收益之间的关系

与 Guiso 和 Schivardi^[18] 的假设相似,居民的企业家才能服从一个随机分布 $\Gamma(x_i)$,则居民创业的概率为 $prob(x_i > \bar{x}) = 1 - \Gamma(\bar{x})$ 。根据企业家才能门槛值 \bar{x} 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居民创业概率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关系如下:

$$\frac{\partial prob(x_i > \bar{x}(w(\bar{w})))}{\partial \bar{w}} = \frac{\partial \Gamma(\bar{x}(w(\bar{w})))}{\partial \bar{w}} < 0 \quad (3)$$

进而,根据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函数,必然能够得到厂商劳动力需求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关系:

$$\frac{\partial L(x, w(\bar{w}))}{\partial \bar{w}} \leq 0 \quad (4)$$

根据图1与公式(3)可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创业者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了从事创业活动的企业家能力门槛,降低了居民的创业倾向,且导致企业的创业规模下降。因此,我们能够得到本文的研究假设: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居民创业的概率将会降低,创业规模减小。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省际层面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与个体层面的创业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创业的

影响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本文借鉴孙楚仁等^[19]的方法,通过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各省地级市的月最低工资,收集了2011年中国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对各省的最低工资水平进行刻画。

另一方面,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个体数据中与创业相关的信息来刻画居民的创业情况。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通过科学抽样,收集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信息,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等。2011年的调查覆盖中国除内蒙古、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对于居民及其家庭的创业倾向、创业规模、创业类型以及创业行业等方面的信息进行了调研,这为相关的创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例如尹志超等^[11]、李雪莲等^[20]的研究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居民的创业行为进行研究。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创业:(1)个体创业 根据就业者的工作性质进行识别,回答工作性质为“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的个体被认为创业。(2)家庭创业 对“去年,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项目”持肯定回答的家庭被认为是创业家庭,否则为未创业家庭。由于家庭创业样本包含了丰富的创业信息,包括了家庭创业的规模、行业与创业类型等信息,本文首先利用家庭创业样本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然后利用个体创业样本做稳健性检验。

(二) 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本文论证的核心在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创业的影响。为了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本文借鉴陈刚^[21]、阮荣平等^[13]、Nunziata *et al.*^[22]对创业的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当地居民创业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可根据创业的不同维度区分为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创业倾向,即对创业的扩展边际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会导致当地居民创业的规模减小,即对创业的集约边际带来负面效应。基于这一角度,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同时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的影响:

$$\Pr(\text{entrep}_{ij} = 1) = \Phi(\alpha + \beta \text{wage}_i + \gamma X_i + \delta Z_j + \mu_{ij}) \quad (5)$$

$$\ln(\text{size}_{ij}) = \alpha + \beta \text{wage}_i + \gamma X_i + \delta Z_j + \mu_{ij} \quad (6)$$

其中 entrep_{ij} 表示地区 i 的家庭 j 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变量等于1则说明该家庭在当年从事了创业活动,反之则说明该家庭未进行创业活动; size_{ij} 表示地区 i 的家庭 j 从事创业活动的创业规模,在本文中对应于创业项目的员工数量; wage_i 表示 i 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单位:百元); X_i 表示地区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 Z_j 表示家庭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对居民创业倾向的回归方程(5)中,被解释变量是典型的虚拟变量类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往往会造成回归系数的有偏,因此我们选用了Probit模型对该类方程进行检验。我们关注回归系数 β 的估计,预期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该省的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居民的创业活力越低,创业规模越小。

为了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导致回归结果的有偏,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地区与家庭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参考吴晓瑜等^[17]、阮荣平等^[13]、李雪莲等^[20]的研究,本文分别加入了地区与家庭层面的变量以控制除最低工资标准以外其他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变量的具体设定如下:

首先,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比重、契约执行效率以控制地区层面的特征,避免其他地区制度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1)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一个地区的创业行为,而且也是决定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也会更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回归中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的影响。本文采用省级的人均GDP加以衡量,并预期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创业行为更为活跃。(2)国有经济比重 由于除了

最低工资标准,市场化条件同样是影响地区创业活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国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私营经济具有挤出效应。因此,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国有经济比重以度量市场化条件对于创业行为的影响。(3) 契约执行效率 契约环境同样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居民创业过程中合同的履行以及收益的获取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成本。因此,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契约环境对于创业的影响,本文借鉴李坤望和王永进^[23]采用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中各地执行契约费用占标的物比重的倒数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大即表明契约环境越好。

其次,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家庭层面的特征因素。(1) 房屋所有权被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家庭拥有房屋所有权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 家庭成员数被定义为所在家庭成员的数量。(3)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被定义为家庭所在的地区。对于中部地区虚拟变量,若创业者所在地区为中部地区则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同理类似定义。

最后,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家庭中户主的特征因素。(1) 已婚被定义为户主是否已婚的虚拟变量,已婚则取1,未婚取0;(2) 年龄被定义为户主年龄的对数值。(3) 汉族、党员与本地户口均被定义为虚拟变量,若个体为汉族(党员、是本地户口)则取1,否则取0;(4) 户主偏好风险度量了户主对于风险的偏好程度。CHFS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个体“如果您有一笔资产,您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共提供了5个风险排序递减的回答选项。本文使用这些选项的倒数用以衡量户主偏好风险,该值越大说明个体越偏好风险。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本文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其进行估计与检验。一方面,我们对基准回归进行相应的汇报与分析,对本文的假说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我们从个体层面样本、变量度量与内生性问题的角度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居民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的影响,因此,本文计量回归结果分别就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进行汇报。对计量模型(5)与(6)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我们利用(5)式,以家户是否创业为被解释变量,使用Probit模型就最低工资对居民创业倾向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表1的前三列中我们具体汇报了各类解释变量对最低工资的边际影响结果。其中第(1)、(2)、(3)列回归结果分别控制了居民所在区域层面的特征控制变量、居民家户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以及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变量系数均为负,且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证明最低工资的上升将显著地降低家庭的创业倾向。在控制了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负,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根据加入地区、家庭与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中最低工资的回归系数为-0.011,这表明:最低工资每增加100元,会使家庭的创业倾向降低1.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也初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说,即最低工资降低了中国居民的创业倾向。

在回归中,我们同样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所得到的结果也与理论预期以及相关已有研究相符。根据表1中的结果,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也即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户创业倾向越强;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对家户创业倾向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国有经济对当地经济控制越大,越不利于居民在事前进行创业决策;区域契约执行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家户的创业活动,说明良好的契约制度环境有利于居民进行创业决策。户主拥有房屋所有权、年龄越高、拥有党员身份和本地户口均对其创业倾向有显著的减弱作用;户主已婚家户的创业倾向显著高于未婚家户创业倾向,且户主越偏好风险、家庭成员数越多,其家庭创业倾向也越高。

其次,利用(6)式,我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就最低工资对家户创业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1中的后三列所示。其中(4)、(5)、(6)列分别是加入区域层面、家户层面和户主个人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均在1%或5%统计水平上显

著为负,且这一结果在加入了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均稳健。这表明,最低工资的上升会显著地降低家庭的创业规模。第(6)列中的最低工资回归系数表明,在控制所有其他变量后,最低工资每提高100元,创业家庭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将下降8.3%,这一结果也初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说,即最低工资不仅降低了中国居民创业的倾向,同样降低了其创业规模。在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结果上,我们发现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国有经济比重对创业倾向

表1 最低工资对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的影响

回归系数	创业倾向			创业规模		
	(1)	(2)	(3)	(4)	(5)	(6)
最低工资	-0.016*** (-3.88)	-0.013*** (-3.17)	-0.011*** (-2.86)	-0.103*** (-2.74)	-0.095** (-2.46)	-0.083** (-2.16)
经济发展水平	0.017** (2.02)	0.028*** (3.30)	0.014* (1.73)	0.336*** (4.43)	0.310*** (3.92)	0.253*** (3.21)
国有经济比重	-0.174*** (-6.28)	-0.201*** (-6.24)	-0.196*** (-6.28)	0.552** (2.12)	0.971*** (3.14)	0.801*** (2.61)
契约执行效率	0.005** (2.04)	0.004 (1.45)	0.003 (1.02)	0.111*** (4.82)	0.106*** (4.29)	0.107*** (4.38)
房屋所有权		-0.084*** (-6.82)	-0.036*** (-3.01)		0.201** (2.41)	0.292*** (3.09)
家庭成员数		0.023*** (9.97)	0.019*** (7.86)		-0.035 (-1.52)	-0.023 (-0.97)
中部地区		0.016 (1.06)	0.011 (0.73)		-0.023 (-0.17)	0.006 (0.05)
西部地区		0.029* (1.69)	0.019 (1.18)		-0.308** (-1.97)	-0.274* (-1.78)
已婚			0.026** (2.57)			-0.100 (-0.90)
年龄			-0.003*** (-9.42)			-0.012*** (-4.10)
汉族			-0.008 (-0.66)			-0.256** (-2.36)
党员			-0.039*** (-4.26)			0.385*** (3.48)
本地户口			-0.048*** (-2.94)			-0.027 (-0.23)
户主偏好风险			0.098*** (5.96)			0.359** (2.41)
拟合优度	0.015	0.036	0.067	0.067	0.078	0.113
样本量	8 433	8 433	8 432	1 115	1 115	1 115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10%、5%与1%显著性水平;(2)表中关于拟合优度统计量的汇报中,对创业倾向的Probit模型估计汇报了其伪拟合优度,而对创业规模报告拟合优度统计量。

向的影响的系数正好相反,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居民创业倾向和创业规模存在差异性影响,在居民进行是否创业的选择时,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可能阻碍着居民的创业决策,而在居民已经进行创业活动之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创业者的雇佣人数越多。其他的控制变量结果则与创业倾向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二) 稳健性检验

(1) 个体层面的创业样本

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最低工资将通过提高创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创业者的创业门槛,降低其创业倾向,这一结论并未区分创业者主体是家户还是个人。表1中所得结果验证了最低工资的提升降低了家户的创业倾向和创业规模,因此我们在此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结论对于个体创业行为而言,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据此,我们使用个人是否创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各类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中的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变量系数同样显著为负,即表明最低工资不仅会降低家户的创业倾向,同样也会减弱居民个体的创业倾向,居民所在地规定的最低工资越高,个体的创业倾向越弱,且这一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我们也得到了与表1相似的结论:经济发展水平、契约执行效率越高,个体的创业倾向越强;国有经济比重越高,个体的创业倾向越低。从而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最低工资对于中国居民创业倾向的提高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

(2) 变量度量的再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2011年的最低工资数据来对当年家户创业变量进行回归,进而对最低

工资的创业抑制效应进行了相应的检验。然而,由于政府在劳动力政策上执行的力度是不断变化的,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执行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尤其对于2011年刚进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地区而言,新标准的执行强度可能并不高。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2010年与2011年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值作为最低工资的代理变量,进而对本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的第(2)与(3)列所示,其中第(2)列对创业倾向进行检验,第(3)列对创业规模进行检验。表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最低工资变量度量的问题后,无论对于创业倾向,还是创业规模,最低工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中国居民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3) 内生性问题

最低工资对创业倾向和创业规模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最低工资会影响创业行为,而政府根据创业行为的特征同样可能调整最低工资,这也就意味着本文的回归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将会造成本文估计结果的有偏与非有效,从而造成文章的推断错误。解决内生性问题,最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找到和解释变量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变量,将其作为工具变量,进而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进行相应的检验。因此,我们也设法采用工具变量法来避免内生性问题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以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

虽然自1993年起,我国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各地区有效地执行。直到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并开始实施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具体规定了最低月工资和小时工资的确定方法,并要求各地必须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从而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建立起了最低工资制度。由于本文采用的是2011年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因此,我们能够采用2004年各地区首次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具变量,其与2011年的工具变量具有相关性,而与2011年家庭的创业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如表2第(4)和(5)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最低工资的系数仍旧显著为负,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与分析

前文根据计量模型对本文的研究假说进行了相应的检验与分析,本节则对居民创业行为做进一步分析与讨论。前文并没有考虑最低工资影响中国居民创业行为过程中,居民创业在创业类型与创业行业上的差异性,本节则由此出发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一) 创业类型的影响

基准回归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创业方式是多样的,可以分为创立、购买、继承、赠与、合伙等。虽然同是创业,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可能对最低工资的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根据中国家庭金融

表2 最低工资对创业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回归系数	个体创业		变量度量		内生性问题	
	(1)	(2)	(3)	(4)	(5)	(5)
最低工资	-0.002*	-0.013***	-0.077*	-0.018**	-0.117*	
	(-1.76)	(-2.92)	(-1.87)	(-2.30)	(-1.66)	
经济发展水平	0.016***	0.012	0.231***	0.020**	0.277***	
	(5.79)	(1.50)	(3.01)	(1.98)	(3.12)	
国有经济比重	-0.072***	-0.186***	0.833***	-0.176***	0.892***	
	(-6.81)	(-5.70)	(2.61)	(-4.70)	(2.59)	
契约执行效率	0.003***	0.002	0.099***	0.006	0.120***	
	(2.86)	(0.88)	(4.25)	(1.41)	(3.61)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092	0.067	0.112		0.112	
样本量	29 314	8 432	1 115	8 432	1 115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10%、5%与1%显著性水平;(2)为了节省篇幅,表中并未汇报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调查中家庭创业相关信息 将居民创业的类型划分为: 创立、购买、继承或赠予、加入成为合伙人、其他。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就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为研究最低工资对创业类型的影响, 将创业类型分为: 未创业 *entrep* 赋值为 0; 以创立方式创业, *entrep* 赋值为 1; 以购买方式创业 *entrep* 赋值为 2; 以继承或赠予方式创业 *entrep* 赋值为 3; 以加入成为合伙人方式创业 *entrep* 赋值为 4; 以其他方式创业 *entrep* 赋值为 5。此时的估计问题同样不是二值选择模型, 因此采用多项选择 Probit 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 并以未创业的家庭作为基准组。

表 3 汇报了最低工资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差异性影响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 最低工资变量的系数仍为负, 表明对不同类型的创业而言, 最低工资均降低了他们的创业倾向, 这一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印证。但是, 最低工资对不同创业倾向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大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通过自己创立或者加入合伙进行创业的创业家户的创业倾向受到最低工资提升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那些通过继承或赠与、购买进行创业的家户, 并且其结果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创业类型不同, 创业者对待创业中所面临的劳动成本等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对于那些通过继承家族产业或接受赠与, 或者是那些有财力购买进

表 3 最低工资对不同创业倾向的影响

回归系数	创立	购买	继承或赠与	加入合伙	其他
最低工资	-0.006* (-1.66)	-0.000 1 (-0.15)	-0.000 1 (-0.32)	-0.003*** (-2.59)	-0.001* (-1.77)
经济发展水平	0.004 (0.48)	0.003* (1.70)	-0.000 4 (-0.60)	0.004* (1.83)	0.003** (2.21)
国有经济比重	-0.182*** (-6.48)	-0.002 (-0.22)	-0.000 3 (-0.14)	-0.013 (-1.34)	0.002 (0.36)
契约执行效率	0.000 (0.14)	0.000 (0.02)	0.000 1 (0.75)	0.002** (2.24)	-0.000 (-0.09)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432	8 432	8 432	8 432	8 432

注: (1)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分别代表 10%、5% 与 1% 显著性水平; (2) 为了节省篇幅, 表中并未汇报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 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进行创业活动的家户居民而言, 他们具有更为雄厚的能力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创业和经营问题, 因此他们对于所面临成本的敏感性自然不如那些“白手起家”、通过点滴奋斗进行创业活动的普通创业者, 当最低工资提高使他们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后者对这一成本上升的反应自然也就大于前者。总体上看, 通过创立和合伙形式的创业活动, 最低工资的创业抑制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 创业行业的影响

基准回归对最低工资创业抑制效应的研究建立在创业行业不存在差异的基础上, 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不同行业是否均具有创业抑制效应, 这是本文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分布于各类不同的行业中, 不同的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存在差异。对于那些对劳动力需求弹性较低行业中的经营者而言,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小于那些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行业中的经营者。为探讨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本文将行业划分为工业、建筑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家庭未创业 *entrep* 赋值为 0; 在工业创业 *entrep* 赋值为 1; 在建筑业创业 *entrep* 赋值为 2; 在生活性服务业创业 *entrep* 赋值为 3; 在生产性服务业创业, *entrep* 赋值为 4; 在其他服务业创业 *entrep* 赋值为 5。本文估计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二值选择问题, 而是一个标准的多项选择问题。因此, 利用多项选择 Probit 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 并以未创业的家庭作为基准组, 回归系数均建立在基准组对比的基础之上。

表 4 汇报了最低工资对不同行业创业行为影响的差异性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表中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后, 相比工业和建筑业而言, 最低工资对在服务行业进行创业活动的创业者影响更大。相比生产性行业而言, 服务性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更大, 同一水平的劳动力成本上

升对服务性行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往往高于对生产性行业的影响。当最低工资上升时,处于服务行业的创业者对这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敏感性也就高于处于工业或建筑业行业内的创业者,这些行业所受到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因此,最低工资对中国居民创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创业活动中。

六、结论

本文在 Guiso and Schivardi^[18] 创业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最低工资标准,讨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居民创业倾向的微观机制。居民的创业倾向不再仅仅取决于其企业家才能,同时取决于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机会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创业的机会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决定了居民从

事创业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值,只有企业家才能高于门槛值的个体将从事创业活动,最低工资标准也就在居民创业选择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最低工资标准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很高时,从事创业的居民将受到极大的挤压。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创业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收集了2011年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并进一步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个体与家庭层面的创业信息,构建计量模型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居民创业倾向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最低工资标准无论从居民创业倾向的扩展边际,还是从创业规模的集约边际而言,均对中国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是导致中国创业受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一百元将造成个体创业倾向降低1.1%。其次,本文同时考察了在考虑创业行业与创业类型不同的情形下创业抑制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创业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服务业项目的创业与创立企业、合伙企业的创业类型方面。最后,本文在研究中考虑了个体创业、变量度量与内生性问题的因素后,均证实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创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从总体上看,本文的研究表明,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抑制中国居民的创业活力,这尤其对于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政府在通过最低工资保障社会公平时,一定要把握好最低工资标准的运用,避免因行政动机过度使用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工具,从而减少其不必要的创业抑制效应,最大程度上发挥大众创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李坤望 蒋为. 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5(8): 48-60.
- [2]杨灿 叶林祥 詹鹏.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中的“攀比行为” [R].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 2016.
- [3]杨振兵 张诚. 《劳动合同法》改善了工资扭曲吗?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5): 52-62.
- [4]范玉波 刘小鸽. 最低工资的经济结构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6(1): 40-48.

表4 最低工资对不同行业创业倾向的影响

回归系数	工业	建筑业	生活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
最低工资	0.001 (0.94)	-0.000 2 (-0.21)	-0.007 ** (-2.03)	-0.001 (-1.59)	-0.003 *** (-2.96)
经济发展水平	-0.002 (-0.75)	0.002 (1.33)	0.009 (1.27)	0.003* (1.91)	0.001 (0.50)
国有经济比重	-0.049 *** (-4.51)	-0.018 ** (-2.55)	-0.121 *** (-4.58)	-0.011 (-1.53)	0.003 (0.45)
契约执行效率	0.001* (1.59)	0.000 (0.29)	-0.001 (-0.21)	0.000 (0.17)	0.001 (1.58)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432	8 432	8 432	8 432	8 432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代表10%、5%与1%显著性水平;(2)为了节省篇幅,表中并未汇报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 [5]叶静怡,赵奎,方敏. 市场、社会行动与最低工资制度 [J]. 经济研究 2014(12):113-125.
- [6]宁光杰.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依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1):26-35.
- [7]马双,张劼,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2(5):132-146.
- [8]胡涛,杜丽群. 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一般均衡分析 [J]. 经济科学 2013(4):16-25.
- [9]赵秋运,张建武.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 [J]. 金融研究 2013(12):44-56.
- [10]林嵩,姜彦福. 创业活动为何发生:创业倾向迁移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6):94-106.
- [11]尹志超,宋全云,吴雨,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J]. 管理世界 2015(1):87-98.
- [12]王立平,陈琛. 创业、知识过滤与区域经济增长 [J]. 产业经济研究 2009(5):60-66.
- [13]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 [J]. 经济研究 2014(3):171-184.
- [14]赵向阳,李海, RAUCH A. 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文化与国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 [J]. 管理世界 2012(8):78-90.
- [15]吴一平,王健. 制度环境、政治网络与创业:来自转型国家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5(8):45-57.
- [16]周京奎,黄征学. 住房制度改革、流动性约束与“下海”创业选择 [J]. 经济研究 2014(3):158-170.
- [17]吴晓瑜,王敏,李力行. 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4(9):121-135.
- [18]GUISO L, SCHIVARDI F. What determines entrepreneurial clusters?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1 9(1):61-86.
- [19]孙楚仁,张卡,章韬. 最低工资一定会减少企业的出口吗? [J]. 世界经济 2013(8):100-124.
- [20]李雪莲,马双,邓翔. 公务员家庭、创业与寻租动机 [J]. 经济研究 2015(5):89-103.
- [21]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5(5):89-99.
- [22]NUNZIATA L, ROCCO L.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background on labor market choices: the case of relig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Z]. IZA working paper, 2011 No. 6114.
- [23]李坤望,王永进.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 [J]. 经济学(季刊) 2010(3):1007-1028.

(责任编辑: 禾 日)

Will the Minimum Wage Restrain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WU Qunfeng¹, JIANG W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ntrepreneurial selection model containing minimum wage and entrepreneur ability, puts forward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theoretical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we use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 in 2011 to verify our theoretical results through econometric models. Both of ou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minimum wage standard significantly suppress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each region. Minimum wage standard not only lowers the willingness to do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but also reduces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Our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minimum wage's suppression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origins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service industries are much mo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minimum wage than manufacture or in architecture industry. Minimum wage also has a deeper suppression effect in thos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tarted by entrepreneur themselves or by partnership.

Key words: minimum wage standar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heterogeneity effect; cost effect